

国外批判视野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与资本主义*

焦 佩

【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引发包括左翼在内的国外人士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他们认为，在经济方面，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导致政府应对疫情的责任感缺失和能力不足、医疗资源的短缺和分配不公、个人承担风险的乏力、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在政治方面，自由民主的光环褪去，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价值与安全、能力、责任、团结、参与之间存在矛盾，投票选举不能保证优质领导力的出现，权力制衡也不能保证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在社会方面，经济结构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下的不平等被疫情放大，彻底暴露资本主义人权的虚伪和社会的裂痕。在生态方面，如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增长和分配方式，绿色发展就只能停留在幻想中，绿色资本主义走不通，生态社会主义才是解决之道。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 消费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焦佩（1979-），山东大学（威海）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山东威海 264209）。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诸多软肋同时呈现，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无法破解所有制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掩盖不了价值的虚幻和治理的低效，进而导致社会不平等普遍存在下的人权不平等和社会分裂性，这些又是生态问题久拖不解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些环环相扣的资本主义问题与我国的抗疫实效相比，“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①。包括法国学者阿兰·巴迪欧、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意大利学者吉奥乔·阿甘本、美国学者大卫·哈维、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美国共产党主席乔·西姆斯等左翼在内的国外人士站在批判的角度，对新冠肺炎疫情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思考，引发了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考和新探索。

一、新冠肺炎疫情与资本主义经济问题

为了实现增殖的目的，资本在市场的调节下选择进入某领域，在完成生产、交换和分配后决定去留，此后循环往复。在此模式之下，不受约束的资本和没有止境的交换是资本无限膨胀的助力，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即是提供这两大助力的理论基础。包括左翼在内的国外人士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缺陷，使资本无限增殖的模式陷入困境。

*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海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20CKSJ16）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2月24日。

1.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政府责任的认知主要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观点：国家主义强调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担负主要责任，并可按需扩大权力；自由主义反对政府以公共卫生事件为由扩大权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国家主义一度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急转直下，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上风，国家责任大幅收缩。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甚至休克疗法，市场的作用被进一步放大。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下的金融危机，开始从治理的角度强调国家、市场、社会和个人之间的责任分担，但并未改变新自由主义的底色，某些国家甚至增加了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色彩。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新自由主义的应对逻辑并无改变。它更关注企业而不是个人在公共危机中的利益，乐于通过税收和货币政策等经济调节手段来刺激企业的抗疫积极性，担心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甚于病患本身。国外人士主要从政府能力、公共卫生水平和个人风险承担范围等三个方面，揭示新自由主义对疫情防控的负面影响。

首先，新自由主义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削减了政府的责任，削弱了政府的能力。国外人士认为，随着市场逐渐取代政府的各项职能，优秀的人力资源不再流向政府，有效的行政管理让位于政客对选民的操控。针对英国和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加拿大学者拉获卡·德塞指出：“40年的新自由主义削弱了国家能力，摧毁了关键机构，并失去了最优秀的人员。在英国和美国，政治阶层都失去了信誉，政治制度也变得混乱不堪，以至于允许彻头彻尾的骗子占据最高的政治职位。这种混乱的制度如何能够产生政治意愿和国家能力以应对正在发生的危机？”^①

其次，新自由主义主张削减公共卫生经费，造成了医疗资源的短缺和分配不公。国外人士认为，在强调利润优先于人的指针下，新自由主义对公共卫生经费采取紧缩政策，公立医院的等待时间变长，住院病房和重症室变少，导致疫情之下出现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和未覆盖弱势群体的状况。针对美国近30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不得不放弃检测和治疗这一现象，美国学者阿比盖尔·尼利和帕特丽夏·洛佩兹进行了抨击。他们指出：“这种在保护公众健康和保护经济健康之间的选择，暴露了美国新自由主义逻辑面临的危机：政府开支的缩减和社会福利计划的削减使最脆弱的人最无力应对。”^②

最后，新自由主义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脆弱性，特别是个人承担风险的乏力。国外人士强调，新自由主义使临时工成为常态，月结、周结甚至日结成为普遍现象，隔离措施使这些非正规就业人员更易失去工作。看到新冠肺炎疫情下新自由主义对经济体系的扭曲，比利时学者瓦莱丽娅·普利尼亚诺和克劳迪娅·玛拉指出：“没有稳定工作的人最有可能受到这一流行病的威胁。这些不能工作的人（失业者），有工作但不能保证工作时间的人（待命的小时合同工）以及所有低收入者，大多是移民、妇女和青年，又大多在清洁、招待和零售等受隔离政策影响的行业工作。”^③

2. 消费主义的危机

消费主义是一种通过树立消费至上的文化价值观来增加社会消费总量，进而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循环并上升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它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刺激消费来提速经济和摆脱危机的实践。

^① Radhika Desai, “The Unexpected Reckoning: Coronavirus and Capitalism”, <https://Canadiandimension.com/Articles/View/The-Unexpected-Reckoning-Coronavirus-And-Capitalism>.

^② Abigail Neely and Patricia Lopez, “Care in the Time of COVID-19”, <https://antipodeonline.org/2020/04/04/care-in-the-time-of-covid-19/>.

^③ Valeria Pulignano and Claudia Marò, “The Coronavirus, Social Bonds and the ‘Crisis Society’”, <https://www.socialeurope.eu/the-coronavirus-social-bonds-and-the-crisis-society>.

马克思在批驳施马尔茨的政治经济学时就已经注意到消费主义，认为它是在谈论“浪费的经济效用”^①。把消费主义变为大规模实践的是20世纪的美国。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百货公司、影剧院和夜总会和普通大众敞开大门，享受当下、及时行乐的消费主义开始出现。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权国家，夸张的广告和露骨的杂志放逐着人们的欲望，消费主义开始在欧美国家蔓延。消费主义赋予消费太多本身之外的意义，自由程度与消费能力挂钩，成功程度与消费数额挂钩。

国外人士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消费主义支撑的资本增殖过程的断裂。一方面是不能消费造成的断裂。应对疫情采取的隔离政策，阻断了与旅游观光、酒吧夜店、餐饮酒店等相关的消费行为，航空公司、客运公司、景区酒店、主题公园、美容健身、剧院影院等行业资本沉没、濒临破产。另一方面是无力消费造成的断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服务和文化产业开始裁员，而从事这些产业的劳动者又大都是临时工，本来就没有多少积蓄的失业人群在病毒和面包之间艰难抉择。有经济学家期待疫情过后的补偿性消费能拯救经济，但是疫情中已经花光仅有积蓄甚至负债累累的民众又怎有能力进行补偿性消费。具体看来，国外人士主要在消费的价值和影响两个方面反思消费主义作为资本驱动力的缺陷。

首先，国外人士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下消费主义赋予消费的额外价值被剥离，消费回归获取使用价值的本意。疫情下的隔离切断了人际交往，蜗居在家的消费无法拿来炫耀，使消费回归本真。英国学者威廉姆·戴维斯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使迎合消费者的灵活生产不再奏效，不可避免地出现消费支出的大量减少，使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甚至接近战争状态，因为“如果人们不再走出家门，那么货币流通也会逐渐停止”^②。同样，意大利学者弗兰克·比弗·贝拉迪在疫情日记里表示，资本主义经济不再被刺激政策激活，必须摆脱经济可以无限增长且必须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公理，接受经济停滞是一个长期的状态，习惯节俭和分享，学会将快乐和消费分开^③。

其次，国外人士发现隔离措施下的消费被局限在有限的领域之内，消费主义造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大幅缓解。暂时的抢购潮过后，各国都出现社区志愿者和邻里互助组织，捐献物资、减免租金，人与人之间的团结程度增强。英国记者杰克·申克写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交距离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亲近。”^④英国学者亚当·夸西一边警告互助作为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核心原则具有局限性，一边认为疫情中的互助不仅可以填补国家责任缺失的空白，而且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社会^⑤。荷兰学者米里亚姆·梅斯纳和费德里科·萨维尼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将每个人看作消费者或竞争对手，然而“在危机时期，人类经济充其量对卫生纸行业有利”^⑥。

总之，新自由主义放任的是资本的权力，削弱的是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疫情来临，弱势群体不仅更易失去本来就不稳定的工作，而且更易被追求利润的医疗服务体系排除在外。同样，消费主义异化了人们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使劳动者囿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从生产和消费两个层面为资本的不断增殖献身。新冠病毒在切断消费链的同时，引发对资本主义增长模式的反思。这些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3页。

② William Davies, "The Last Global Crisis Didn't Change the World, But This One Could", <https://uk.news.yahoo.com/last-global-crisis-didnt-change-060025923.html>.

③ Franco "Bifo" Berardi, "Diary of the Psycho-Deflation",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600-bifo-diary-of-the-psycho-deflation>.

④ Jack Shenker, "Cities After Coronavirus: How Covid-19 Could Radically Alter Urban Life", <https://desispeaks.com/cities-after-coronavirus/>.

⑤ Adam Quarshie, "Solidarity in Times of Crisis",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619-solidarity-in-times-of-crisis>.

⑥ Miriam Meissner and Federico Savini, "Corona and the Climate: 5 Lessons We Can Learn", <https://planetamateur.com/2020/03/20/corona-and-the-climate-5-lessons-we-can-learn/>.

济层面的批判为政治、社会和生态层面的批判奠定了基础。

二、新冠肺炎疫情与资本主义政治问题

自由民主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光环”，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后抛出的“历史终结论”将这一“光环”的亮度调到了极致。在晕轮效应之下，直选投票制度、分权制衡制度、地方自治制度、司法独立制度成为救世良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手持此方，到处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而不顾“自由”和“民主”的真谛又在现实中究竟兑现几许，正是“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自己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①。包括左翼在内的国外人士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将自由民主送上风口浪尖。

1. 自由民主价值的虚伪性

自由民主是支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价值，但如果缺少安全、责任、平等、效率、团结、参与等价值的支撑，就只能成为一部分特权阶级享有的奢侈品。具体看来，国外人士主要从自由和民主两个维度来揭露资本主义价值的虚伪性。

第一，资本主义的自由与安全、责任、平等之间存在矛盾。美国学者大卫·拜恩观察到资本主义的自由正在与安全发生矛盾，那些为阻止感染蔓延而采取的措施会破坏自由，但是能够保证民众的健康和安全，并尽快恢复工作，对此提出“为了改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的健康、安全、经济 and 福祉，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放弃我们作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②的问题。对此，虽然阿甘本以“赤裸生命”的概念来批评政府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干预措施，认为恐惧正在合理化政府的紧急状态政策，将社会变得除了生存而没有其他价值，这引发了一场围绕生命与自由关系的辩论^③。但是，阿甘本并没有正确区分新冠肺炎与普通流感的差异，生命政治学的矛盾和局限被新冠病毒放大，选择“常规”任由新冠蔓延到“集体免疫”，还是选择“例外”来保护人们的健康和生命，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成为辩题。对此，法国学者让·吕克·南希认为，新冠下只有“例外”，自由应该与责任同行^④。同样，意大利学者塞尔吉奥·苯汶努托主张更应关注“例外”的“非例外性”，普遍隐居将成为习惯，保持距离才是表达爱意的方式^⑤。美国学者戈登·赫尔说，如果将隔离等同于“赤裸生命”，那么正中特朗普的心思，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出门工作让资产阶级变得更加富有^⑥。

第二，资本主义的民主与效率、团结、参与之间存在张力。首先，资本主义的民主只能解决授权的问题，并不能保证权力的有效行使。美国学者大卫·伦西曼指出，民主政治被看作政党为争取选民支持而进行的竞争，政党和领袖获得权力后如果不能正确有效地使用，选民只有等待下一次选举的到来。但是，当疫情让生命岌岌可危时，等待下一次选举显得过于漫长，即便日后政客得到惩罚，他们至多是失业，而许多民众却为此付出了生命^⑦。其次，他们发现资本主义的民主缺乏团结和参与。英国学者克莉丝汀·贝瑞警示道，民主主义正在与新自由主义结合以巩固选举同盟，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92页。

② David Byrne, “The World Is Changing—So Can We”, <https://reasonstobecheerful.world/the-world-is-changing-so-can-we/>.

③ Giorgio Agamben, “L’invenzione di un’epidemia”, <https://www.quodlibet.it/giorgio-agamben-l-invenzione-di-un-epidemia>.

④ Jean-Luc Nancy, “Eccezione Virale”, <https://antinomie.it/index.php/2020/02/27/eccezione-virale/>.

⑤ Sergio Benvenuto, “Benvenuto in Clausura”, <https://antinomie.it/index.php/2020/03/05/benvenuto-in-clausura/>.

⑥ Gordon Hull, “Why We Are Not Bare Life: What’s Wrong with Agamben’s Thoughts on Coronavirus”, <https://www.newappsblog.com/2020/03/why-we-are-not-bare-life-whats-wrong-with-agambens-thoughts-on-coronavirus.html>.

⑦ David Runciman, “Coronavirus Has Not Suspended Politics – It Has Revealed the Nature of Power”,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mar/27/coronavirus-politics-lockdown-hobbes>.

济与政治都没有实现权力的下放,缺乏民主参与,危机过后将迎来更好时代的想法,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乐观左派的预测一样,是一种危险的、过时的观点^①。最后,资本主义民主正在让位于社会主义的民主。美国学者李·琼斯认为,新冠病毒正在终结资本主义的民主。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就开始崩溃,空洞化的民主观念无法应对新冠病毒,英美两国“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放弃了数十年来被视为不可改变的政策,转而走上几天前被指责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道路”^②。

2. 自由民主制度的局限性

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发表多篇文章反思资本主义制度。他在《决定一个国家对抗新冠病毒能力的因素》一文中认为:“决定政府绩效的关键因素将不是政体的类型,而是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程度。”^③在《流行病与政治秩序:国家的必要性》一文中,他虽然继续强调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具有变革和适应的能力,但是不得不承认美国在危机管控中表现不佳。“当危机来袭时,这个国家唯一的不幸是,它的掌舵人是现代史上最无能且最分裂的领导人。”^④事实上,这种将责任推给总统个人的说法,本身就暗含让其当选的制度具有局限性的意思。具体看来,国外人士主要从选举和治理两个维度来揭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局限性。

第一,投票选举并不能保证优质领导力的出现。选举是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产生方式,由选举产生的社会精英代替民众行使国家权力。这里的前提是,候选人中有胜任的领导,民众能够分辨出候选人的能力高低,并相信当选者能担负起代表的责任,否则,民众将通过罢免和新的选举实现权力更迭。然而,不断增加的选举费用使参选门槛变高,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又消解了民众理性投票的假设。对此,戴维斯指出,当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正面临信任缺失的危机,即大众不断质疑记者、专家、政治人的公信力,怀疑他们是希望通过公权来谋取私利的人,转而支持反建制的“新型的英雄式的说真话的人”^⑤。美国学者史蒂芬·沃尔特用“令人尴尬的惨败”一词来形容美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结果,指出“特朗普更像是一个表演者而不是领导者”,“当面临需要成熟的领导才能解决的突发性复杂问题时,他必然会处理失当,然后推卸责任”^⑥。

第二,权力制衡并不能保证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资本主义的权力制衡只限于精英集团内部,大众对精英集团的牵制却乏善可陈,不仅不能防止权力的滥用,而且会导致效率低下。对此,法国学者马塞尔·戈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西方民主制度具有软弱性和无序性的劣势,社会缺乏凝聚力,从而无法有效应对疫情^⑦。相反,这种傲慢使他们“习惯拿着放大镜对中国挑毛病”^⑧,拒绝吸取社会主义的抗疫经验。德国学者马吕斯·梅恩霍夫认为,正是这种后殖民主义的偏见,将疫情与非自

① Christine Berry, “The COVID-19 Pandemic Will Change Everything - For Better or Worse”,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613-the-covid-19-pandemic-will-change-everything-for-better-or-worse>.

② Lee Jones, “Coronavirus Is 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 <https://tribunemag.co.uk/2020/03/coronavirus-is-the-end-of-the-end-of-history>.

③ Francis Fukuyama, “The Thing That Determines a Country’s Resistance to the Coronavirus”,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3/thing-determines-how-well-countries-respond-coronavirus/609025/>.

④ Francis Fukuyama, “The Pandemic and Political Order: It Takes a Stat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0-06-09/pandemic-and-political-order>.

⑤ William Davies, “Why We Stopped Trusting Elit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nov/29/why-we-stopped-trusting-elites-the-new-populism>.

⑥ Stephen Walt, “The Death of American Competence”,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23/death-american-competence-reputation-coronavirus/>.

⑦ Sébastien Le Fol et François-Guillaume Lorrain, “Marcel Gauchet: ‘Avec le Coronavirus, on Redécouvre la Souveraineté’”, http://www.politique-autrement.org/IMG/pdf/2_200321.pdf.

⑧ 焦佩:《海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观点比较及其启示》,《探索》2020年第1期。

由主义制度的失败强行联系起来，才给西方国家造成巨大损失^①。另外，权力制衡下的党派竞争和地区竞争导致西方国家的抗疫能力进一步被削弱。美国记者罗纳德·布朗斯坦指出，共和党主张放宽管制、恢复经济，民主党主张加强管控、挽救更多弱势群体的生命，这种政策差异的原因只是因为选票来源的不同，共和党的选票主要来自地广人稀的小城镇和乡村，是否管制与感染程度相关性不高，民主党的选票主要来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管控缺失将造成大规模群体感染^②。同样，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抗疫中不是形成合力，而是相互竞争，在州政府遇到抗疫困难时，特朗普只会袖手旁观^③。

总之，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政治只停留在原则的层面，而不考虑是否践行。疫情之下，当政府无法切实担负责任、有效保证公民安全时，自由民主就成了低效无能的遮羞布；当金钱政治和权力制衡使公民不能通过选举代议的方式来保障自身权利时，自由民主就成了遭受不平等待遇的边缘化人群的安慰剂。在不摆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情况下，追求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与水中捞月无异。

三、新冠肺炎疫情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

受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支配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却对两极分化乐见其成。两极分化的经济状况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疫情放大了这种社会的不平等。包括左翼在内的国外人士对新冠肺炎疫情下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予以猛烈抨击，揭露了资本主义人权的虚伪和社会的撕裂。

1. 人权的不平等

资本主义的人权观重视政治权利，忽视生存权利，认为生存权利属于经济范畴，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横加指责。然而，新冠病毒威胁的不仅是经济范畴的生存和发展，而且是生命本身。国外人士发现，新冠病毒看似在传染方面一视同仁，实际上蕴含着极端的不平等。具体看来，他们主要从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两个方面来揭露资本主义人权的不平等。

第一，经济不平等造成资本主义人权的不平等。建立全面覆盖的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只存在于政治家描绘的理想蓝图中。事实上，在医疗卫生事业交由市场规则决定的情况下，因贫致死、因病返贫的情况普遍存在，新冠肺炎疫情只是放大了这种危机。首先，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的歧视问题。英国学者马西莫·德·安吉利斯批评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救治老人的行为，“死亡人数最多的是老年人，当医生不得不决定谁可以生存或死亡时，差别就变得尖锐起来，因为医生必须优先考虑仅剩的用于复苏的呼吸机”^④。其次，对贫穷的歧视问题。美国学者迈克·戴维斯将新冠病毒比喻为怪物，一方面主张免费获得疫苗、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应该是一项基本人权，认为“如果市场不能为此类药物的廉价生产提供激励，那么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应该对其生产和分销负责，穷人的生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比大型制药公司的利润重要”，另一方面批评西方记者和社会忽视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穷人带来的危险，特别提醒“新冠病毒可能在非洲和南亚的贫民窟走上一条不同的、更致命的道路”，

① Marius Meinhof, "Othering the Virus", <https://discoversociety.org/2020/03/21/othering-the-virus/>.

② Ronald Brownstein, "The COVID-19 Crisis Reveals an Old Divide Between the Parties",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0/03/what-covid-19-debate-has-common-aca-fight/608797/>.

③ Aaron Maté, "Chomsky: COVID-19 Strikes, Solidarity Can Help Defeat Trump and the Neoliberal Assault", <https://thegrayzone.com/2020/04/29/chomsky-covid-19-strikes-solidarity-can-help-defeat-trump-and-the-neoliberal-assault/>.

④ Massimo De Angelis, "The Political Use of Parasites", <https://undisciplinedenvironments.org/2020/03/21/the-political-use-of-parasites/>.

因为“富裕国家和富裕阶层将把重点放在拯救自己之上，而忽视国际团结和医疗援助”^①。

第二，社会不平等造成资本主义人权的不平等。新冠肺炎疫情下，隔离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停滞和失业增加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转移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将健康问题政治化，将疾病和公民身份联系在一起，通过污名化特定的外部群体来缓解压力。首先，是对华裔甚至是亚裔的种族歧视。英国学者蒂姆·克雷塞韦尔指出，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试图避免使用“武汉”或“中国”的字样来给病毒命名，但是仍不能阻挡特朗普称之为“中国病毒”，不能避免对华裔和亚裔的歧视^②。其次，是对移民的歧视。比利时学者米妮娅·塔那塞斯库认为欧洲有将移民看作传播疾病的人的传统，如果生活在欧洲边境肮脏环境中的难民感染了新冠病毒，各国政府一定会进一步收紧边境^③。最后，是对女性和同性恋等其他群体的歧视。尼利和洛佩兹注意到公共护理的性别问题，感慨“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构成医疗一线的大多数人都是有色人种妇女，但是其中许多人还生活在该国反移民风气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中”^④。另外，英国学者安吉拉·莱斯特认为，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中女性和同性恋不会被当作女巫而烧死，但仍会受到指责和迫害^⑤。

2. 社会的分裂性

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权的不平等导致权利和义务的不平衡，“因为它一方面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⑥。针对这种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或是归于个人能力的差异，或是通过社会福利制度来加以缓和，其实不过是不愿意放弃资产阶级的特权。事实上，恩格斯早已指出，对无产阶级而言，“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经济的领域中实行”^⑦。具体看来，国外人士主要从新冠肺炎疫情催生的各种社会运动入手，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分裂性。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催生大规模反对包括种族歧视在内的社会运动。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名黑人犯罪嫌疑人遭受白人警察长时间的膝盖压迫后死亡，引发美国各地爆发近几十年来波及范围最广的反对种族歧视的街头抗议和骚乱。从表面来看，这是一起暴力执法案件。其实，这与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种族歧视相关，只是被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而已。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以后，各地都出现一系列警察和治安维持会成员的杀人事件，封锁和隔离措施并未消除对黑人的压迫，反而增强了这种压迫，使工人阶级，尤其是黑人成为病毒的最大受害者。美国共产党、美国自由道路社会主义组织、美国世界工人党、美国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都先后发表声明，谴责警察暴行，声援示威游行。美国社会活动家格洛丽亚·鲁巴克发表对休斯顿哈里斯县监狱状况的调查报告，发现黑人囚犯的比例远高于该地区成年黑人的比例，监狱未采取任何隔离措施，每周只发放一个口罩，新冠检测阳性比例超过半数，还有许多囚犯没有得到检测或检测后未被告知结果，保释工作暂停^⑧。

① Mike Davis, “The Monster Is Finally at the Door”, <https://socialistresurgence.org/2020/03/12/covid-19-the-monster-is-finally-at-the-door/>.

② Tim Cresswell, “Turbulence and COVID-19”, <https://tjresswell.com/2020/03/21/turbulence-and-covid-19/>.

③ Mihnea Tanasescu, “Viral Political Ecology”, <https://thecivilanimal.com/2020/03/10/viral-political-ecology/>.

④ Abigail Neely and Patricia Lopez, “Care in the Time of COVID-19”, <https://antipodeonline.org/2020/03/10/care-in-the-time-of-covid-19/>.

⑤ Angela Last, “COVID-19, ‘European Science’ and the Plague”, <https://discoversociety.org/2020/03/24/covid-19-european-science-and-the-plague/>.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2-113页。

⑧ Gloria Rubac, “COVID-19 Hot Spot”, <https://www.workers.org/2020/06/49346/>.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促使美国左翼运动力量增长。“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①，美国明尼苏达州针对黑人暴力执法引发的反对种族歧视运动不会止步于此，将激发各种受压迫群体的反抗运动。对此，美国工人运动家汤姆·索托表示：“命令工人重返工作，却不能治愈由病毒引起的肺炎，而且也不提供预防接种疫苗，这就等于判处成千上万工人的死刑。许多人的悲伤很可能会变成愤怒，社会政治生活物质条件的变化将成为大众意识变化的先导。”^② 美国学者伊莲·戈弗雷指出，自2020年3月以来，估计已有1万人加入民主社会主义者分会，目前该组织的成员总数达到约6.6万^③。正是美国社会的分裂性使各类受压迫的大众投身社会运动，而特朗普的言行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裂，因为正是社会分裂才促使他上台，进一步分裂才能对其连连连任有利。因此，西姆斯认为大众必须组织起来，将民主斗争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团结起来投身到竞选运动中击败特朗普，将社会的发展方向变得有利于工人阶级和民众^④。

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和社会地位处于弱势的群体不仅感染新冠病毒的危险更大，而且接受检测治疗的机会更小，甚至会成为社会泄愤的替罪羊。对此乐见其成的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催生社会的分裂和动荡，各种反对歧视的社会运动促进了左翼的联合和影响力的提升。

四、新冠肺炎疫情与资本主义生态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强制暂停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运作模式后生态环境的好转，暴露了资本主义生态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注重效率、提倡浪费，将自然放在无限索取的位置，关注气候变化却不愿意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关注生态问题却不愿意降低消费水平，使气候和生态问题变为碳交易和政治秀。包括左翼在内的一些国外人士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生态问题。

1. 生态问题的原因

新冠肺炎疫情显示，生态环境变化正在导致新型病毒频繁出现。在生态问题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习惯将原因归结为发展中国家对自然的盲目开发，忽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造成的根本影响。此次，虽然国外人士还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看作生态危机的驱动力，但是也开始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才是根本原因。具体来看，他们主要从资本主义的增长方式和分配方式两个方面来分析生态问题的原因。

第一，资本主义增长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英国学者彼得·琼斯、里克·斯塔福德和马克·马斯林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已经清晰地看到经济增长放缓和环境问题改善之间的强相关性，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如果不发生根本变化，疫情过后这种强制性的经济放缓措施也不可能延续，相反考虑到经济复苏的优先地位和经济衰退导致对绿色能源技术开发投资的不足，可能还会导致碳排放量的进一步增加^⑤。克雷斯韦尔指出，虽然环境变化对人的健康和生命危害更大，但是我们从不考虑改变资本主义的增长方式。“一些人估计，由于空气污染的减少，挽救的生命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2页。

② Tom So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 Historic Event That Will Intensify Global Working-Class Struggle", <https://www.workers.org/2020/06/49094/>.

③ Elaine Godfrey, "Thousands of Americans Have Become Socialists since March",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0/05/dsa-growing-during-coronavirus/611599/>.

④ Joe Sims, "From Uprising to Elections and Beyond", <https://www.cpusa.org/article/from-uprising-to-elections-and-beyond/>.

⑤ Peter Jones, Rick Stafford, and Mark Maslin, "What COVID-19 Can Teach Us about Governance", <https://theecologist.org/2020/apr/08/what-covid-19-can-teach-us-about-governance>.

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还要多，也许前者是后者的20倍。”^① 针对是否可以通过绿色技术的开发来化解资本主义增长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法国学者卢卡·帕尔特里涅利的回答是，虽然绿色资本主义在集体意识的层面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良方，但是事实上却行不通，因为资本主义不愿意自觉作出改变^②。同样，梅斯纳和萨维尼也认为应该抛弃绿色增长的幻想，“在气候危机的背景下，刺激经济进一步增长就像是举办野生的新冠病毒派对，同时给所有参加派对的客人提供美味的、可能会降低感染率的维生素丸”^③。

第二，资本主义分配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英国学者詹妮弗·约翰逊认为，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右翼政客都错误地将生态环境的恶化归结于人口的增加，控制所谓的低端人口的增长，试图建立专制的、白人至上的世界，是生态法西斯主义。其实，在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中处于有利地位的发达国家和资产阶级才是气候犯罪的主犯，单就交通排放来看，全球使用能源最多的前10%的消费者中，一半以上与人的移动有关。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会购买汽车，开始到国外度假。但超级富豪们不会乘坐拥挤的廉价航班前往最近的温暖海岸线，而是包租私人飞机。据估计，私人飞机每个乘客一英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商业客机的20倍。考虑到全球大约80%的人从未踏上过飞机，大约10%的人没有用过电，可见认为人类是地球上的瘟疫似乎极不公平，因为一些人比其他人的毒性要大得多^④。针对国家之间的生态环境差异，美国学者罗伯·华莱士分析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其中的作用，认为不平等的生态交换将工业和农业造成的环境问题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例如，大豆跨国公司在玻利维亚、巴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的大量出现就是跨国资本的产物^⑤。

2. 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案

既然绿色资本主义行不通，那么社会主义道路便成为不二的选择。大卫·哈维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的所有问题连同生态问题的解决都直指社会主义，并提醒道：“如果唯一可行的政策是社会主义，那么执政的寡头无疑会采取行动，确保他们是国家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人民社会主义者。反资本主义的政治任务就是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⑥ 具体看来，国外人士主要从增长方式和所有制两个方面来分析社会主义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对策。

第一，生态社会主义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增长方式的缺陷，实现绿色发展。生态社会主义将当代生态学的研究成果与社会主义的构想结合在一起，在批判资本主义造成生态危机的基础上，重新反思人与人、人与技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认为穷人不应该吞下富人因敛财和享乐造成的生态危机苦果；在人与技术的关系方面，认为技术不应该为资本利润的最大化服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社会主义虽然提出了推翻资本主义才能解决生态问题的思路，但是没有将社会主义革命落实在行动中，仅仅停留在话语策略和话语政治的层面。

华莱士认为，在生态社会主义之下，工农业的生产模式将彻底改变，生态与经济、城市与农村、

① Tim Cresswell, "Turbulence and COVID-19", <https://tjresswell.com/2020/03/21/turbulence-and-covid-19/>.

② Luca Paltrinieri, "Prove Generali Di Apocalisse Differenziata", <https://antinomie.it/index.php/2020/03/01/prove-general-di-apocalisse-differenziata/>.

③ Miriam Meissner and Federico Savini, "Corona and the Climate: 5 Lessons We Can Learn", <https://planetamateur.com/2020/03/20/corona-and-the-climate-5-lessons-we-can-learn/>.

④ Jennifer Johnson, "We Are Not the Virus",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622-we-are-not-the-virus>.

⑤ Rob Wallace, Alex Liebman, Luis Fernando Chaves, and Rodrick Wallace, "COVID-19 and Circuits of Capital", <https://monthlyreview.org/2020/04/01/covid-19-and-circuits-of-capital/>.

⑥ David Harvey, "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http://davidharvey.org/2020/03/anti-capitalist-politics-in-the-time-of-covid-19/>.

开发地区与未开发地区之间断裂的新陈代谢将得到修复，生物的多样性和自然选择被重视，进而从源头阻止病原体的出现，这样一来，不仅各类人群之间的团结在增强，而且国际合作也变得更加现实^①。同样，拜恩也认为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的相互竞争模式，只有跳出竞争对手和贩卖对象的思维定式，才能解决生态问题，“为了让资本主义以任何形式生存下去，我们必须变得更社会主义一点”^②。这些观点都具有共同之处，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生活环境的改善并不等同于生态环境的改善，面对疫情，人类必须反思资本主义本身的诸多缺陷。虽然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已经出现萎缩乏力态势的生态话题的关注度，但仍然没有摆脱浪漫主义乌托邦的范畴。

第二，国有化是解决资本主义分配不平等的有效方式，进而可以解决生态问题。让·吕克·南希认为，通过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得到彰显^③。在此脉络上，诸多国外人士将疫情的蔓延归结于医疗保健事业的私有化。美国社会运动家安德烈·马尔科夫斯基指出，美国加州早在2006年就意识到必须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到来做好准备，计划国家投资4亿美元以增强政府应对重大流行病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先后建立了三家移动医院并购置大量应急医疗设备，但是2011年加州通过了一项紧缩预算的法案，导致该计划搁浅，使其无法有效应对疫情，因为以营利为导向的私立医院在疫情中只会关门谢客^④。

总之，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通过科技的进步和向海外转嫁生态危机来寻找出路只是饮鸩止渴。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树立健康的生产和消费观念，评估科技的生态效应，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专注分配的全民普惠，才能解决生态危机。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的各种问题并未因不断调试而消失，只是暂时缓和，一有危机就会加倍显现。对此，齐泽克表示，“冠状病毒给共产主义带来了新机会”^⑤；巴迪欧甚至呼吁，“希望整个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人，必须利用这一流行病的间歇期”，以努力开启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⑥。

这些国外人士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丰富我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应以资本主义的教训为镜，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侵蚀，推行供给侧改革，提倡勤俭节约，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完善社会主义分配体制，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高医疗保障的覆盖程度和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合作体系。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求是》2020年第8期。

[2]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3]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编辑：刘曙辉）

① Rob Wallace, “Notes on a Novel Coronavirus”, <https://mronline.org/2020/01/29/notes-on-a-novel-coronavirus/>.

② David Byrne, “The World Is Changing—So Can We”, <https://reasonstobecheerful.world/the-world-is-changing-so-can-we/>.

③ Jean-Luc Nancy, “Communovirus”,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626-communovirus>.

④ Andrej Markovčić, “Capitalism Caused the COVID-19 Crisis”, <https://jacobinmag.com/2020/04/coronavirus-covid-19-crisis-capitalism-disaster/>.

⑤ Charlie Nash, “‘What I Like About Coronavirus’ by Slavoj Žižek”, <https://spectator.us/like-about-coronavirus-slavoj-zizek/>.

⑥ Alain Badiou, “On the Epidemic Situation”,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608-on-the-epidemic-situation>.